

引用格式:张明. 现代性问题及其中国语境——中国现代性的特殊阐释及其学术争论[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13-25.

Citation Format: ZHANG Ming. Modernity and Its Chinese Context: A Special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Modernity and Its Academic Controversy[J].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2019(6):13-25.

现代性问题及其中国语境

——中国现代性的特殊阐释及其学术争论

张 明

[摘 要]考察现代性的产生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很难超脱其成熟形式,即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代性而孤立自存。较之于西方现代性的内生型结构,近代中国现代性问题,更多地是在西方殖民主义现代性扩张的背景下被动产生的。因而对中国现代性生成机制的分析,其实在本质上就是探讨中国近代资本现代性的“缺场”及其被动“出场”问题。中国近代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形式,前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巨大历史惯性,在直接意义上决定了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非自主性生成,这是在阐释中国现代性问题时必须充分考虑的特殊性所在。

[关键词]现代性;中国语境;殖民主义;非主体性;另类可能性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012414390102)

[中图分类号]B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19)06-0013-13

DOI: 10.3969/j.issn.1009-105x.2019.06.002

在学术语境中,对现代性的研究并非简单地对一个概念进行所谓的抽象逻辑思辨。现代性这一概念从其源点就是作为对现代生活之属性的理论描绘,这也是英语语境中作为现代性单词之后缀“-ity”所呈现出的基本理论规定性。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而言,对于现代性的研究其实是对现代性这一概念体系所表征的现代生活的社会样态与社会属性的探究。那么,究竟是何种因素促成了现代性的生成?尽管目前学界在这一问题上仍然存在争议^①,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一般意义上肯定的是,现代性在现象层面呈现的现代生活,其发生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无法超脱客观经济因素而孤立自存,这从根基上是由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决定性的基本原理所

^① 争议主要表现在如下两方面:一是关于现代性源点的界定,有学者将现代性奠基于十六十七世纪,还有学者将其更早地推向十二世纪;二是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很明显与上述关于现代性之起源密切相关。有学者将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做等同处理,与此相反,有学者将现代性视为资本主义得以萌生的重要基础性因素,更有学者将现代性作为资本主义之成熟形态展开的样式。

形塑的。正如有学者对于现代性核心内容的描绘那样,物质性的现代性进程以及被这种进程裹挟于其中的现代人,二者之间的交融互动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丰富而复杂的经验关系,以及最后在哲学观念上对于这一历史进程或者推波助澜(表现为现代主义的倾向),或者冷嘲热讽(表现为反现代主义的特质)的理论表达,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的核心内容^①。

所以,对于内部自身本来就包含着悖论的矛盾系统的现代性而言,从经济或者客观物质生活视角展开对现代性的探讨不失为一种简便的方式。那么,缘何较之于西方社会,中国未能自主性生发出自身的现代性,而是以被动的姿态卷入现代性的世界体系之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其实从本质上关涉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定位与特殊生存境况。

从现代性的最初起点上来看,这一全新社会形式的产生与宗教神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因为倘若从词源学上来看,“现代”一词最初的主旨在于将当时刚刚确立下来的基督教与旧的异教罗马社会区别开来。所以,从最初意义上来说,“现代”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概念。随着时间的发展,现代性概念在其最为典型意义上的“出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之间逐渐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尽管在一开始指涉中古时代,但它并非意味着中古性。现代性与中古时代的分道扬镳,尽管在一开始是很缓慢的,但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经历过技术与观念的双重积累(观念与技术)——也就是霍布斯鲍姆所言的由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共同组成的“双元革命”(dual revolution)^②之后,在18世纪晚期,这种决裂构成了全盘性决裂,至此现代性的高潮就出现了^③。可见,考察现代性的产生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很难超脱其成熟形式——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代性而孤立自存。

所以,对中国现代性生成机制的分析,其实在本质上就是探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缺场”问题。然而,中国近代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形式——前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巨大惯性,决定了中国现代性难以自主生成。有学者曾明确指出,中国从来就未有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无论在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上和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上,都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洗礼。”^④因此,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是科学把握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基础性前提。

一、现代物质生产方式与现代性的自主性生发

从现代性的现象学定义层面而言,所谓现代性可以具化为若干细则或标准,诸

① 汪民安. 现代性[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48.

②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革命的年代:1789—1848[M]. 王章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③ 汪民安. 现代性[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50-51.

④ 李泽厚.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32.

如生产方式上的机械化、工业化生产,精神层面的理性主义,交往方式的全球主义,社会生活方式的都市化、城市化,等等。很明显,在上述评判准则之中,经济因素以其独特的形式将自身从上述标准之中超脱出来。尽管精神生活、交往方式等层面的内容也可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使一种社会形态具有区别于他者的显著特征,例如,启蒙理性精神催生下的主体性意识觉醒,在很大程度上使得17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以宗教、宗法为依托的封建社会。但是,无论是精神层面抑或是交往形式层面的新样态,从最基础层面而言,仍然是从属于经济形式并受其支配。正如马克思明确指出的那样,“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西方现代性从最显著层面呈现出的现代社会生活样态之所以能够在本质上从前现代社会形态之中超脱出来,其中决定性的因素仍然是经济形态,即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现代物质生产方式,而这在现代性的典型阶段则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如果从最初意义上如波德莱尔一般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暂时性、瞬间性、易变性,或者说如齐格蒙特·鲍曼一般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似“液化”过程一般的“流动性”^②,那么,作为现代生活属性、社会样态的现代性,缘何能够呈现出与前现代社会如此不一般的差异性——动态的转折性?其原因归根结底,需要从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视角加以把握与透视。这一点从社会生活样态的差异性之中很明显可以看出来。前现代社会生产方式主要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生产者大部分是以家庭或宗族为单位进行相对孤立的自给自足式生产。主体从事生产的直接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延续自身以及家庭成员的生活活动本身,这就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所言的人类生存和历史发展的“第一个前提”,即“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③。在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支配下,人们都是以相对孤立的原子般样态而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极其狭小和有限范围之内发生着。他们或者通过家庭、宗族等自然形式发生着关系,或者通过土地本身而结合在一起。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当时分工水平的限制。尽管在封建等级所有制阶段已经出现了由土地所有制所支配的农奴劳动与由少量资本支配的帮工劳动的区分,并且分工水平也有所发展,但这都是由小规模粗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工业的狭隘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因此,“在封建制度的繁荣时代,分工是很少的”^④。正是分工的限制,使得生产者必须完成生产活动的整个过程,也直接造成了主体因直接束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②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化[M].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5.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9.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

于土地之上而产生相对狭隘的社会关系状态。

相反,在现代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主体从事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仅仅满足自身的肉体需要,而主要是为了创造交换价值。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分工水平的进步,生产者由于自身知识水平与能力的差异,不可能完全掌握整个生产流程,尤其在机器化生产占据统治地位的大工业时代。因此,生产者逐步被内化为生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与其他生产者发生联系,甚至是仍然保持着相对孤立的单个手工生产者也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活动来满足维持自身生活物质活动的需要。也就是说,在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的现代社会,个人之间已经摆脱了前现代社会宗法-血缘的自然联系形式,人与人之间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关系,通过交换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联结。并且,正是随着分工的拓展,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大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的拓展也保持了同频率的姿态。

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支配性,尤其是随着大工业化与市场化步伐的推进,现代性以势不可挡之趋势集中涌向人们,正是在这种视觉或感觉的强烈刺激与冲击下,所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构成了由现代生活所形塑的现代人对于现代性最为直接的经验体验^①。现代性的这种易变性、瞬间性及其造成的心理、社会效应,在《共产党宣言》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与大工业的描述之中以极为显著的形式呈现出来。在马克思的笔下,资本主义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相辅相成,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一切国家、民族与地区。资产阶级在其统治地区将一切宗法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被无情地排除在资产阶级之外。原先存在着联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封建自然法则,被资产阶级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所取代。资产阶级在其时代所带来变革的深刻性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无可比拟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这是马克思从纵向的时间维度出发,在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对比,得出现代性的深刻转折性与变动性之特征。

同样,从横向角度出发,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易逝性也作出了深刻的描绘。他指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维持自身存在的唯一法则便是对全部社会生产关系保持不断的革命,这种生产的不断变革造成了社会状况的不停动荡与变动不息,这种转瞬即逝的深刻变动性也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区别于以往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

^① 马歇尔·伯曼.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M]. 徐大建,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们的相互关系。”^①这种从横向视角出发对于现代性所引起的深刻变动性之特征的阐释,尤其是“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②的理论描摹,在以极为深刻的形式为读者展现现代性之特征的同时,也深刻指证了现代性产生与高涨的本源性因素——现代资产阶级物质生产方式。

二、中国前现代的经济形态与现代性自主生发的理论间距

通过上面的相关阐释,不难发现,西方现代性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导源于资本主义现代生产方式的作用。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资本主义现代生产方式框架下的现代生产、生活样态呈现出与前现代社会形式极大的断裂性,在这种瞬间即逝的流变性之中,前现代固有的历史运行方式以及人们对于世界的感知、认识方式都发生了格式塔式革命。也正是在这种巨大的历史变迁性之中,现代性作为资产阶级对前资本主义一切阶级之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前现代生产形式反动的胜利宣言书而“出场”了。换言之,现代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撑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之中得到了最集中、最全面的呈现,在此背景下,现代性与资本主义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达形式罢了。那么,当时中国的情况如何?缘何近代中国未能如西方一般自主性地从内部生发出自身的现代性?在我们看来,需要将研究的视角转向对当时中国前现代经济形态与生产方式的研究之中,亦即回答“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

实事求是而言,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是否存在问题上,目前学界仍然存在争议。一般而言,受经典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影响的传统观点,认为近代中国缺乏自主衍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结构——“封建经济论”,即使存在所谓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② 目前学界关于现代性的相关思考,存在着二元分裂的态势,即从经济、政治层面理解的“现代化”与从艺术、文化和感受力等层面理解的“现代主义”之间的截然分裂与对立。在上述关于现代性的二元性因素之中,倘若要确定马克思的理论定位的话,一般而言,学术界普遍认同马克思在现代化文献学中的重要地位,诸如他关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大工业机器化生产的深刻描述。但是,在论述现代主义的相关文献之中,学界都倾向于认为马克思处于“缺场”之状态,因为现代主义的文化或意识在起源学上都一般被人们追溯到与马克思同时代的人物诸如波德莱尔、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身上。马歇尔·伯曼认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形象比喻,以鲜明的方式为他在现代主义谱系中的定位作出了坚实的证明,同时这也构成了消解现代性研究之中现代化与现代主义二元分裂的有效方案。因为“这一形象所包含的宇宙范围和视觉上的宏伟,它所拥有的高度压缩了的戏剧性力量,它所具有的含糊的启示意义,以及它的观点所蕴含的歧义性——那种摧毁性的热力同时也是极大的能量和一种生命的外溢——所有这些品质都被认为是现代主义想象的特点。”([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M].徐大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13-114)马克思在上述比喻之中,通过对现代性在时间层面的变动,尤其是现代性所造成的强烈冲击——“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激发了主体对于历史戏剧性剧变所带来的精神创伤的思考。因此,伯曼将《共产党宣言》视为未来世纪现代主义运动的原型与宣言,因为它不仅表达了现代主义文化中的某些深刻见解,而且也将现代主义文化中的某些最为深刻的矛盾戏剧化了([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M].徐大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15)。

资本主义也不过是萌芽而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而余英时和黄宗智等学者则对上述观点提出了最为坚决的批判,他们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起源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性,反对套用西方社会理论来研究中国问题。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集中批评了经济决定论研究倾向——仅仅注重中国近代商人的客观经济活动,忽视了对商人的文化背景、价值伦理等因素的分析。余氏运用了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相关分析范式,从中国新禅宗、新道教和新儒家这三大宗教伦理的入世转向出发,阐释了中国宗教伦理对于近代商人精神的形塑问题。黄宗智尽管从提问方向上与余英时一致,即认为必须具体、独立地探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问题,但是,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别:与余英时运用韦伯分析范式从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之中推导出中国商人精神与中国存在资本主义的路径不同,黄宗智认为,中国近代以来数百年商品化发展与现代资本主义之间存在巨大的间距,即中国并没有因为商品化的发展而产生独立的资本主义。其原因在于,中国近代的商品化趋势更多的是与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相挂钩,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并未能如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一般转化为资本的积累。与余氏基于中西方相似的历史现象(中国近世宗教从“出世”向“入世”转变对中国商人精神的形塑与韦伯所言的新教伦理精神对资本主义精神的作用等相似社会历史现象)进而得出相同的社会历史学判断的思路不同的是,黄氏透过这一现象层面“相似”的帷幕,洞察了这种“近之”背后存在的巨大差异。因此,黄氏提出了一个在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的重要研究范式上的问题,即“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能否运用西方社会历史学界以西方近现代历史为基础的理论范式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目前在此问题上争讼不断,我们也无意给这一“思想难案”增加任何新的观点或看法。笔者在这里所要做的就是,从中国近代生产方式与经济形态的客观历史背景出发,探寻中国近代以来现代性问题“缺场”的客观历史原因。

关于中国近代以来经济形式或经济属性的界定问题,学界在六十余年的发展历史中对此问题作出了系列探讨,呈现出了不同观点与派别的争论与分歧,前面提及的中国有无资本主义的争论仅仅是这一大争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初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五阶段分期”理论影响下产生的中国“封建主义经济论”——将中国理解为与西方进步资本主义相异的停滞不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了论证这一观点,相关研究的主要观点是: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从生产关系视角出发,从封建等级的剥削关系以及前商品化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生产方式阻碍手工业从家庭之中分离出去形成作坊,进而影响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然而,这种研究范式随之受到“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冲击,即中国近代(明清时期)并非停滞不前的自然经济形式,反而包含着资本主义预兆与萌芽的种种变迁,其类似于16世纪左右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这种研究主要从下面三个方面展开:一是

从实证层面收集资料,证明近代中国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二是从封建生产关系入手,通过阐释土地租佃关系证明封建生产关系的衰落,通过雇佣劳动关系的兴起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三是从生产力视角切入,通过对近代经济发展的阐释来证明资本主义的发展。黄宗智认为,“资本主义萌芽论”的观点协调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五阶段论”与中国反帝民族主义情结之间的紧张关系^①。也就是说,倘若承认中国在近代没有资本主义,那么就意味着中国的近代化或资本主义化是完全由西方输入的,即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哈佛学派的“冲击-回应”模式,这种看法与中国近代基于被动压迫、挨打基础上形成的民族主义情结之间是不相容的。因此,“资本主义萌芽论”既可以满足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预设,也可以缓和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结。与国内学界存在的“封建主义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之争情况相似的是,西方学界在此问题上也存在着“近代早期中国”(中国在受到西方影响之前的时期存在着大规模的商品化发展,类似于国内学界的“资本主义萌芽论”)与“传统中国”(费正清学派的“冲击-回应”模式)的争论。

尽管上述四种认知模式之间的争论十分激烈,但它们之间却存在着基本的通约性因素,即共同遵循、承认的基本认知规范,亦即美国科学理论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提出的“范式”(Paradigm)概念,这就是都认为近代化等同于商品化,商品化必然会催生资本主义。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境况究竟是否如上述研究范式所规定的那样?通过黄宗智先生对中国近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商品化发展趋势的历史性、实证性考察不难发现,中国近代商品化蓬勃发展与小农生产停留于糊口水平两个现象的同时发生构成了一种悖论,而正是这一悖论造成了近代中国缺乏生成资本主义的内部自主性结构要素。他认为,在1350年至1950年长达6个世纪的蓬勃商品化与城市化发展中,甚至是1950年后的三十余年集体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长江三角洲小农农业依然长期处于糊口水平,这在理论上直接与马克思、斯密的商品化必然导致小农经济分化的理论判断相悖。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存在的商品化趋势,因为缺乏自主的内在结构性因素,所以并未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这就是小农经济因“家庭化”与“过密化”导致的“没有发展的增长”^②。黄宗智通过对近代以来中国小农经济的历史考察,得出以下判断:商品化的趋势不但未能如马克思和斯密所设想的那样消解小农生产,反而增强了小农家庭的生产;原先存在的雇佣劳动非但没有进一步发展,反而为更加强大的家庭小规模生产(家庭农场)所取代;基于家庭血缘联系基础上的自然分工非但没有消逝,反而因商品化变得更加完备;农业与手工业、城乡之间的分工非但没有出现,反而在小

① 黄宗智. 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的悖论现象[EB/OL]. [2019-01-01]. <http://www.aisixiang.com/data/6153.html>.

② 黄宗智.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 北京:中华书局,1992:11.

家庭生产之中变得更为紧密;“商人资本”非但没有转化为“工业资本”,反而依然保持着与生产的脱离。总而言之,“500年的商品化并未导致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早期的发展,而是使小农经济和家庭生产更趋完备了。”^①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简单得出如下结论,以回应中国缘何未能自主生出现代性问题。从总体上来说,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以个体小农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紧密结合在一起为主要特征的^②,从经济形态层面而言,小农个体生产方式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之间仍然存在着质性差异,它本质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里,不妨以黄宗智的相关论点展开进一步探讨,具体而言:

第一,中国数千年形成的小农经济生产形式,不仅没有在近代商品化浪潮之下瓦解,反而呈现出愈发增强之趋势。甚至,与传统观点所宣传的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破坏性作用这种定论相异的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没有引起小农经济的质性转变,反而进一步造成了小农经济的过密化。尽管中国农民在人口数量上占据绝大部分,但是基于过密化小农生产形式的限制,倘若缺乏其他中介性组织力量,中国小农将会持续维持一种“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然宗法村社的活动与交往之狭隘范围^③。

第二,近代商品化浪潮不仅未能瓦解家庭小作坊式生产形式,反而导致家庭化趋势的不断强化——儿童、妇女作为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家庭作坊的发展,这从根本上增强了小农经济的力量,从而很难造成由家庭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变。

第三,小农经济的过密化,将大量人口束缚于土地或手工生产之上,未能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大量的自由劳动力。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小农经济的破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流浪农民(自由劳动力)成为促进工场手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这种流浪现象是和封建制度的瓦解密切联系着的”^④,并且,过密化的小农经济进一步维持了顽强的地主制,而地主制正是有能力扼杀资本主义农业经营方式的形式^⑤。尽管自宋朝以来,中国城市商业的发展与非农业人口的增加呈现出同频率的趋势,但是这些非农业人口只有极小部分转化到手工业生产部门之中,其他绝大部分都沦为贫民,因此,这种商业的繁荣与非农人口的剧增因为是完全扎根于不同的社会结构之中,所以其实质上只是“假资本主义”^⑥。

第四,中国近代以来长期存在并持续增强的低成本小农经济,造成农村劳动净

① 黄宗智.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 北京:中华书局,1992:305.

② 胡绳.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

③ 金观涛,刘青峰. 新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24.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9.

⑤ 黄宗智.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 北京:中华书局,1992:331.

⑥ 金观涛,刘青峰. 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75.

收入长期停滞在维持生计的边缘,因此很难实现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积累的过程。正如黄宗智所言:“与明清时期市场发展相伴随的,是一种过密型的、以糊口为目的的小农经济的逻辑和习惯。在这一小农经济中,事实上商品化较多地为榨取剩余及维持生计所推动,较少地为追逐利润而推动。”^①

第五,小农生产方式的生产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交换价值,而是为了消耗使用价值。小农生产的产品大致具有两大使用价值:一是满足自身及家庭需要的农产品;二是生产自身及家庭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同样,地主与贵族通过地租、赋税形式获得的剩余价值并没有及时转换为扩大再生产,而是直接用于个人消费。正如毛泽东所言:“那时(古代的封建社会——引者注)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②

因此,以资本主义生发的一般结构性因素为评判标准——尽管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与特征,但这不妨从一般意义上把握其中存在的通约性要素之可能——来衡量的话,中国长期存在并在近代“逆势增强”的小农经济之生产形态,从根基上决定了近代中国不可能内在自主生发自身的现代性。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视差及其惯性作用

除了从经济因素层面探讨中国现代性“难产”的研究路径之外,还有研究从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等维度出发探求中国现代性“缺场”的原因之所在。这种研究思路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到韦伯研究范式的影响。韦伯认为,新教改革及其形成的伦理变革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尔文教的禁欲主义使得积累成为教徒唯一正当的目的,消费因此被严格限制,其产生的结果便是资本的积累。因为新教徒积累并扩大财产的目的是神授予的荣耀,只有保持禁欲主义的生活态度,并借助不休止的劳动才能实现上述神圣职责。“此种生活方式的起源,如同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许多构成要素,在某些根源上可追溯到中世纪,但直到禁欲主义的基督新教的论辩当中,才找到其首尾一贯的伦理基础。这对资本主义发展所具有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③也就是说,对于作为上帝选民的新教徒而言,无止境赚钱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非理性过程构成了人的“天职”之所在,并且吊诡的是上述非理性目的又必须建立在基于可计算性与合理性的理性主义之上。正如吉登斯所言,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旨在阐明加尔文教的某些教义信仰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经济伦理之间存在着一种“选择性的亲和力”,也就是说,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应当从加尔文教所阐发的那种新的宗教伦理中

① 黄宗智.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 北京:中华书局,1992:30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24.

③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康乐,等,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72.

去探寻,正是这些新的特性使得“潜含在现代资本主义活动背后的态度与先前大多数资本盈利形式所具有的与道德范畴无关的特性区别开来。”^①韦伯以宗教文化为工具的研究范式,不仅被用来探讨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及其发展问题,而且也被其用于阐释中国近代难以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

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韦伯通过对中国最主要的两种宗教伦理与西方新教伦理的分析比较,得出中国之所以未能自主产生资本主义,其原因在于儒教伦理的阻碍作用——“没有歇斯底里的禁欲及与此类似的宗教信仰形式”^②。这种阻碍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或者说韦伯是通过下面两个评判标准来阐释他的相关论述的。第一,从宗教脱掉巫术的程度来看,儒教未能从积极的救世作用层面触及巫术,因此,现代西方式的经济理性与技术理性在中国受到了绝对排斥;第二,从宗教将神同世界的关系程度以及与此相对立的宗教本身同世界的伦理关系统一起来的程度来看,儒家将这种关系降低到了最低限度,因此通过返诸内心的方式虔诚地服从世俗权力的固定秩序成为儒教伦理的存在形式^③。韦伯提出的中国缘何未能自主产生资本主义的“韦伯命题”及其从宗教文化视角出发所作的阐释,为后续的相关研究铺设了基本的路径。因此,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出发,解读中国现代性(主要表现为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代性以及资本主义)成为区别于从经济视角出发的一种另类探索。

余英时就深受韦伯上述研究思路的影响,这一点从他将其与康德比肩、将新教伦理精神比附中国近代宗教伦理的操作路径之中便可窥见一斑,他认为韦伯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解释蕴含着一种可以被用来反观中国缘何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形态的理论力量^④。余氏在详细考察中国近代宗教的入世转向以及中国商业、商人精神的发展历史之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判断,即近代儒学转向自身对于商人精神形成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讨论。他认为,商人是士以下教育水平最高的一个社会阶层,商人对于儒学之偏爱的原因在于其相信儒学能够帮助推动商业活动的更好开展,而儒学的价值典范与道德说教对于近代商人精神(勤俭、诚信)伦理的形成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由此观之,尽管余英时在研究中国宗教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采取了韦伯式的提问方式,即从宗教社会学的路数出发阐释中国近代宗教“入世转向”及其形成的宗教伦理对于中国近代商人精神的塑形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余氏的“问题式”生发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中,但是他得出的结论与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之中却是截然相反的。

① 安东尼·吉登斯.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M]. 郭忠华,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168-170.

② 马克斯·韦伯. 儒教与道教[M]. 王容芬,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84.

③ 马克斯·韦伯. 儒教与道教[M]. 王容芬,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79.

④ 余英时.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395.

然而,余氏的上述研究也受到国内一些学者的批评,这种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余氏研究中存在的内在矛盾性,即他一方面称自己的研究是基于中国历史发展特殊情境基础上作出的理论分析,并非是“亦步亦趋地按照韦伯的原有论著的实际内容来研究中国历史的演变”^①,但另一方面他的相关分析与阐释又是紧密围绕在韦伯的研究范式周围,通过大量对于“韦伯问题式”的比附来阐释自己看似异端的观点,其实质上不过是韦伯问题的翻版。因此,这种批评意见认为,余氏的提问带有方向性混乱,其实不过提出了一个“假问题”。因为探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对于商人精神的影响究竟要说明什么是含混的。“如果仅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性研究,则当属于一个史学的论题;如果按照韦伯的问题意识提问,则这一动力关系的分析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②尽管从现象层面而言,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诸多方面确实与韦伯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存在相似之处,但这种直接显性层面的“庶几近之”在背后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这也就是上述黄宗智在《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的悖论现象》中提出的直接套用西方历史社会学理论范式研究中国近现代问题的理论非法性所在。因此,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就应当被转向另一个双向层次,即一方面应当明确中国近代缘何没有产生资本主义不能仅仅从西方殖民侵略等偶发因素视角加以探讨,而需要从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自在结构”视角出发去提问;另一方面从一个更根本性层面而言,仍然需要审视韦伯比较宗教学中提出的问题,即中国近代社会内部缘何从文化基础上未能提供形成资本主义的“酵素”。这也是笔者努力想去发掘的重要层面。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以儒教文化为代表)之所以缺乏促进现代性自主生成的内在结构性要素,主要是因为中国持续存在两千多年的“宗法一体化”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超稳定的结构。纵观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进程,很难说中国内部没有资本主义的因素,而是缺乏推动资本主义由潜在变为显在、由隐性变为显性的内在生长机制。非但如此,其内部还存在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机制。金观涛、刘青峰的《新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一书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出发,着力阐释了中国长期存在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对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封建社会的稳定持续的塑造作用以及对于资本主义因素的抑制效果。所谓“一体化”即是指将意识形态中的组织能力与政治结构中的组织力量耦合起来,使意识形态为政治结构提供权威等组织要素,从而形成一种超级组织力量^③。这里所言的意识形态主要是指儒家学说,尤其是国家学说,因为统一的信仰与国家学说是通过意识形态将人们组织起来的巨大力量,官僚机构则是政治结构中的组织力量,而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组

① 余英时.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399.

② 刘小枫.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80.

③ 金观涛,刘青峰. 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28.

成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儒生。因此,儒家学说就具备了使政治与文化一体化的功能,这种一体化功能主要体现在对分封制的调节、对人身依附关系的限制以及对军事割据的抑制上。

“宗法一体化”结构的长期存在,严重抑制了城市与新阶级的出现——强控制与郡县制使然,封建官员对经济活动持有的强大话语权与通过官办商业机构对经济的强大操控力,使得商人难以自主分化成一个独立的阶层。因此,中国的城市与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空间的西欧城市不同,其受制于强大封建政治结构的控制,因自身具有强烈的地方行政政治色彩而难以促成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生成。此外,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强大影响——市民阶级的弱小使得王权难以与资本主义结合,传统知识分子难以分化出一个新的阶层进而承担起完成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与意识形态结构中新因素的结合之任务,上述方面直接造成了中国存在的资本主义因素难以在意识形态之中寻求到自己的代言人与中介^①。对此,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也曾指出,资本主义之所以未能在中国兴起,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商人从来不能摆脱士绅及其官府代理人的控制而独立自主。因此,在他看来,中国产生的不是一个资产阶级,而是一个大不相同的新阶级^②。国外有学者也从民族主义角度出发分析了传统文化的反现代特质,这种观点认为,19世纪中国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并未如20世纪一般产生出激烈的革命性反抗,封建统治集团的“自强”运动也不过是一种防御性动作,其并未转变成一场创造性运动,它不过是为了避免激进现代化而作出的保守妥协。中国传统社会内部缺乏变革力量的重要原因与其归咎于帝国主义,倒不如归因于中国的社会秩序、国家和文化之强大。“阻碍中国对西方的威胁作出迅速反应的抑制因素主要是中国文化的坚强内聚力和稳固的结构。”^③基于中国内部传统和应对西方殖民主义现代性扩张考虑上作出的革命性变革,其本身就应当归属于推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升级,亦即从属于现代性的叙事谱系之中。而传统文化对于这种创造性革命的遏制,在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其与现代性诉求的理论间距之存在性。

概言之,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产生从根基上与西方殖民主义现代性的扩张密切相关,尽管西方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所谓“冲击”与“回应”模式具有一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但从历史的起点上看,中国现代性问题确实并非自身内部矛盾因素相互作用的自生型产物。必须要看到的是,尽管近代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语境有其特殊性,但恰恰是这种基于殖民主义现代性基础上的非主体性,催生了中国在求索自身现代性过程中得以不断生发出关于西方现代性的一方面积极向往、另一方面却保持

① 金观涛,刘青峰.新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157-170.

②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49,31.

③ 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M].陈仲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346.

深刻警惕与焦虑的矛盾心态,这种矛盾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建构出一种关乎自身现代性方案另类探索的理论心态。当前,以中国道路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性方案的另类可能性,从历史发展的谱系角度来看,可以溯源于近代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历史性特征之中。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

(责任编辑:肖爱华)

Modernity and Its Chinese Context: A Special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Modernity and Its Academic Controversy

ZHANG Ming

[**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on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ity is very difficult to get rid of its mature form, that is, the modernity with capital logic as its core exists in isolation. Compared with the endogenous structure of Western modernity, the emergence of modernity in modern China is more passive under the expansion of Western colonial modernity. Therefore, the analysis of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Chinese modernity is essential to explore the "absence" and passive "appearance" of Chinese modern capital modernity. The special form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 and the huge historical inertia of pre-capitalist economy, politics and culture have directly determined the involuntary generation of Chinese modernity issue, which is the particularity that must be fully considered when interpreting China's modernity issue.

[**Keywords**] modernity; Chinese context; colonialism; non-subjectivity; alternative possibility